



南海研究丛书

主编：张一平

百越研究（第三辑）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
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一平
吴春明 主编
丘 刚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南海研究丛书

主编：张一平

百越研究（第三辑）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
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一平
吴春明 主编
丘 刚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越研究 (第三辑):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环南海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一平, 吴春明, 丘刚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8

(南海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0290 - 3

I. ①百… II. ①张… ②吴… ③丘… III. ①百越—民族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5359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66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6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序

当今世界，海洋问题已经成为资源分配、空间争夺和国家战略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南海问题变得日趋复杂、日益突出，不仅成为一个区域热点，而且正在上升为全球热点。这一切都使得南海区域在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解决南海问题方法的多样性，但无论如何，这都要求我们重视对南海的整体研究。既要研究南海区域内各国家、地区、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也要研究南海区域与其外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

众所周知，传统的东南亚研究、南洋研究等，都不包括对中国的研究，都不能把南海周边国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研究，这当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主张使用“南海区域”这个概念，即把南海海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主要包括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通过对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的考察，使人们了解南海区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期对处理当今区域内的各种相互关系和共同构建和谐的区域社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南海海域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南海周边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条航线犹如无形的纽带，把南海周边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自秦汉始，南海周边的国家和人民就在相互影响与相互联系中共同生存、发展，具有共同的命运和利益，南海海域也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要道。进入近代，南海周边的国家和人民同样遭受着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共同开展了反殖民、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先后走上独立的道路，迎来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历史联系性，并未受到学术

界的足够重视。

历史上,南海区域各民族在地缘、血缘、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联系,其历史演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地理上看,南海区域是一个以海洋、岛屿、江河、山脉为纽带连接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很早以前就相互往来,共谋生存。早在汉代,中国就与马来半岛的国家有了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马来半岛成了东西方贸易的交会地点。明朝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和文化交流,使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达到鼎盛。南海区域由若干小经济圈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区域经济圈,并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太平洋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成为全球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经过长期的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血缘关系、文化心理、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内各地区、各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日益表现出高度相似性,这从东盟“10+3”机制和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举办可见一斑。

在进行南海研究时,有些学者倾向于用“西方冲击论”来解释亚洲近代历史的演变,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以欧洲的眼光看待亚洲的分析方法,往往忽略了对亚洲社会赖以生存的、长期形成的原有体系的深入研究,割断了该区域历史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也有学者主张从亚洲的视角看待亚洲近代历史的变化以及与欧洲的关系,以寻求亚洲史内在的联结纽带,推导出亚洲发展的内在原动力,认为亚洲近代发展并非单纯地、被动地接受欧洲冲击—反应的结果,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但是,对亚洲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脱离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联系,也是无法全面和深入的。

在我看来,南海研究应当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以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为经,以南海区域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为纬,将整个南海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在泛南海的区域范围内,既研究文化历史的同中之异,也研究历史文化的异中之同,从而存异求同,以便能更准确地反映南海区域各个国家、民族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变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海南岛及南海诸岛为中心、以南海海域为视野、以东南亚诸国为系带、以环太平洋为辐射,深入、全面地发掘、整



理、保护、宣传南海区域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海岛、海湾、海峡、海礁、海洋和南海周边国家的诸多社会、历史、文化问题，以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南海的开发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发展，构建南海区域的和谐社会。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在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之际，加强南海研究已经刻不容缓。当前急需研究的问题应当从历史文化着手，这是因为对区域内各国人民的历史文化进行透彻的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也将有所帮助。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情况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自然就包括了要维护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也将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一个实际贡献。而且，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仅依靠政治、经济，更不能全然依靠武力，因为无论问题怎样解决，最终都离不开各方的合作，从长远意义上来说，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结局。合作的前提条件是相互理解，而理解的前提则是对彼此历史文化背景的了解和认同。因此，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对南海区域历史文化展开相应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海南省位于南海区域的中心地带，对南海研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8年7月，海南师范大学成立了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10月升格为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现已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0余人，海外特约研究员10余人。目前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第一，南海区域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包括南海区域的文学艺术、民歌民谣、民俗礼仪、手工技能、方言戏曲、音乐舞蹈以及传统技艺与技能等研究。

第二，南海区域物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包括南海区域史前文化遗迹、历史建筑、海洋文物、古物古籍、传统医药、自然景观、海洋地理、生态环境以及有保护价值的自然区域、地形、植物、矿物等自然景观研究。

第三，南海区域社会发展研究，具体包括南海区域历史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生态、民族、宗教、地理、文学、艺术等问题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以及移民开发、侨乡侨务、海上旅游等研究。



第四，南海区域历史沿革及文化交往研究，具体包括文化交流史、海上交通史、丝绸之路、民族史、典章制度、海洋经济、宗教信仰、商业贸易、华侨华人、国际关系、跨文化合作等研究。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该基地的研究成果。在这套丛书中，既有个人著作，也有集体著作；既有专著、编著，也有译著。丛书的总体规模暂不限定，计划先用几年时间，陆续推出十余种著作。目前选题以历史文化为主，今后逐渐扩大研究范围。丛书的宗旨是以南海历史和文化作为研究的起点，逐步对南海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为国家在新世纪的海洋开发战略服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乃至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应当特别感谢的是暨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他们从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和图书市场走向的战略眼光出发，克服了学术著作出版的种种困难，对本丛书的选题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在每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的各个环节中，他们都表现出精益求精的出版风格和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使本丛书得以顺利出版问世。

是为序。

张一平
2012年春于海南岛

目 录

总 序 / 1

百越族群与文化 / 1

夏商时代的百越民族集团	黄懿陆 / 2	目
越文化渊源略论	徐日辉 叶琦 / 15	录
越国的世系年表与越国被灭的确切年代	石奕龙 / 26	
楚瑶族群认同宽容务实文化的探讨与评价	盘立 / 37	
略论东瓯与闽越族同源	钟礼强 / 48	
先秦时期百越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与发展	张合荣 / 60	
“雒田”问题研究考索	王柏中 / 70	
试论《越人歌》背后的象征意义	周羽 / 88	
从“伏羲”的古越语特点说起	董楚平 / 97	
从越濮“裸国”到南岛“裸番”	何斌 吴春明 / 104	
蛙图腾的民族考古研究	彭维斌 / 121	

百越考古 / 135

试探海南考古材料中的百越文化因素	郝思德 黄兆雪 / 136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王银平 / 149
岭南新石器时代圈足陶器传统的产生与确立	何国俊 / 159
昙石山遗址出土“塔式壶”考辨	王有为 / 171
关于桂东与桂东北早期岩洞葬的探讨	洪德善 官春燕 / 182

论浙江商周原始瓷生产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背景	陈元甫	/ 191
浙江温岭大溪古城的文化内涵及其与闽越文化的关系	田正标	/ 201
从江南东周考古看楚文化对吴越文化的影响	申伊欣	/ 216

百越与海洋 / 227

论南岛语族的起源	何英德	/ 228
先秦时期岭南越人的航海活动与对外交通	覃主元	/ 237
从东夷、百越到华南“汉人”：亚太海洋文化的土著性	吴春明 佟珊	/ 246
环南海地区早期玉器的海洋交流	石荣传	/ 257
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海贝与南海的关系	肖明华	/ 272
关于合浦汉墓出土金珠饰品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洪波	/ 281
“西于”铜器、“九真”陶器与龙编侯墓	蒋廷瑜	/ 291
多元文化的交融：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	廖国一 白爱萍	/ 300

百越变迁及相关文化 / 319

南朝隋唐时期岭南宁氏、冯氏家族与土著俚僚的关系	覃芳	/ 320
岭南俚人的生计方式及其经济社会封建化演变	陈光良	/ 328
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	黄纯艳	/ 342
明清时期东南畬族的迁徙与发展	王利兵	/ 360
闽地民间信仰的复合与传承	任杨娜	/ 370
海南疍民问题再研究	张朔人	/ 378
从八桂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互动看百越文化活力	盘福东	/ 390
当今越南占族人的文化	王献军 朱纬	/ 403
论越南北部京族符咒文化的一些特点 (越南)	武洪述	/ 419
海南文化的自然主义特征及其历时性结构	张一平	/ 433

后 记 / 446

百越族群与文化



夏商时代的百越民族集团

黄懿陆

(云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南海
研究
丛书

众所周知，夏商时期崇鸟。特别是商代，此俗更甚。《诗经·商颂·玄鸟》有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一、文献古籍中百越民族的“鸟神”崇拜——越王与鸟文化

一般地说，尊鸟崇鸟是稻作文化的产物。先秦史籍《山海经》中就有了关于“羽民”的记载。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实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其语曰‘鸟禽呼’，嚙蹠嚙蹠，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夏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瑞，以为百姓请命，自后稍有君臣之义，号曰无壬。”《吴越春秋》中的这段记载讲了三层意思：

(1) 讲述了百越之王——禹崩之后的事。大禹治水之后，泱泱九州之地恢复了生机，农业生产随即转入正常。人类既然能够控制水患，自然就有了很多的农田。由于当时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农田耕种不过来，上天就派了很多鸟来帮助人民耕田。人民对大禹治水的功劳念念不忘，夏王朝



的第一代国王，也就是禹的儿子启颁布诏书，建立了禹王庙，要求百越民族每年春播秋收之际，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祀仪式以纪念大禹。

(2) 夏朝的国王从启开始，传到少康已是第六代。每年祭祀大禹的活动都是由中原的夏王直接对百越民族进行安排和指挥的，少康担心越地祭祀大禹的活动不能持续下去，就派了小儿子无余到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去当越王，专门主持祭祀大禹的仪式。这个时期，从大禹时代开始的鸟田耕种一直没有中断，代代相传。

(3) 从无余开始，越王传了十几代，最末一代王没有能力，祭祀大禹的活动于是就停止了。在百越民族中有一个能人挺身而出作“鸟禽呼”，自告奋勇为民请命，因而得到了百越民族的拥戴，成了第一个纯百越民族血统的越王。于是，人民又恢复了夏代开国时的“禹祭”，“安集鸟田之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无论谁为越王，都要“安集鸟田之瑞”。也就是说，百越民族有云集“鸟田”，期盼百鸟耕耘“鸟田”，祭祀鸟神，崇拜鸟神的传统。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的《二十五别史》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下有群鸟耘田也。’《水经注》：‘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皇览》曰：‘禹冢在会稽山上。’”《吴越春秋》是东汉人赵晔的著作，这至少可以说明，百越民族从先秦开始，直到东汉时期仍然崇尚鸟神，农耕时节寄希望于“布洛陀”来到人间。从史料中可以看出，那时人们的耕作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低，与其说是请鸟助人耕田，不如说是惧怕漫天鸟类吃掉人们为数不多的稻谷，希望鸟类是人类的朋友，甚至宁愿把它们当作神灵来崇拜供奉，其主要目的就是保证收成不减。由是，越人的鸟神崇拜油然而生，代代相传。

二、商代的崇鸟民族

（一）语言学方面的证据

鸟神崇拜是稻作民族的产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一个“𪎩”



字，许慎解释说：“秣，稻属。从禾，毛声。伊尹秣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秣。”在这里，“秣”是表音文字，义为“饭之美者”。伊尹是商朝的有功之臣，在其言中仍含有表音文字，称“饭”为“秣”，这正是如今百越民族后裔壮、傣、布依等民族对“饭”的表音。有学者认为“南海之秣”即“岭南之秣”，表明“商汤时代南北交通更加便利，西南、东南诸族已向商朝有所进贡，许多农作物随着民族的交流传入黄河流域，稻谷可能在此时传入商地，而稻谷的语音‘秣’也因此流入中原”^①。我们认为，商汤时代，恰恰正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交织、碰撞时期，汉语的“禾”与百越语言“秣”的共用，就是证明。在伊尹说这些话的时代，说“禾”或“秣”，可能都不需要解释，说者心知肚明，听者亦如此。而且甲骨文表明有“西戍”，“商”字本身也是表音文字，说明商代的主流语言有可能是吴越民族的语言。

（二）甲骨文上出现越人的记载

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殷代的“西戍（越）”》一文中指出：“殷卜辞中有关戍之刻辞，见于《类纂》页940—942。戍又称戍方（仅见于《合集》29648）。晚期卜辞有‘西戍’一名。”^②

乙丑，王……伐西戍……余其比……示余受[出祐]（《合集》36532）

……𠄎孟邛方率伐西戍，典西田（《合集》7100 = 甲2239）

他若7隐若7100云：

……自西戍……

根据卜辞记载，饶宗颐先生认为“殷时有西戍断然无疑”。而且，“殷时已有西戍，戍人足迹于西北，由来已久……先秦以来，戍人足迹，拓殖甚广，分布几乎远至域外”。^③

① 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② 李季：《千秋索引 百年寻觅——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③ 江林昌、朱汉民等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三）戍人是进行巫术占卜的主体

甲骨文出现戍人为巫术占卜主体的记载。《古越国兴衰变迁研究》列举了戍人进行巫术占卜的甲骨文资料：

“贞，戍不其来。”

“贞，戍获羌。”

“贞，戍不其获羌。”^①

国家是一种人群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被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上甲骨文记载了和“戍”这个部族有关的占卜活动，想必越人是这些卜骨筮辞占卜的主体。“中国古文明把世界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层次，人与神，生者与死者。谁能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对话，谁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古代中国，酋长也好，王也好，皇帝也好，都兼任头号大巫。作为统治者必须以巫师和巫术独占二者之间的沟通权，即文献上说的‘绝地天通’。”^②

（四）氏羌人是商族祭杀的对象

西塞罗在《共和国》中说，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国家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马克思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形式的暴力。甲骨文既然出现以越人为主体的卜辞，显然他们是占卜集团的主体民族，独揽着“巫师和巫术独占二者之间的沟通权”。据统计，甲骨文出现被斩杀者约有万人，多数是氏羌人。卜辞告诉我们，越人捕获了氏羌人；同时，卜辞还告诉我们，氏羌人是商人集团斩杀祭祀的对象，甲骨文上还出现商族“一次杀掉1000人”的记载，这均是氏羌人的记录。在征得上苍的同意之后，

^① 马雪芹：《古越国兴衰变迁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第57页。

^② 李季：《千秋索引 百年寻觅——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商族对征伐而得的氐羌人战俘和奴隶大开杀戒。^①《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众所周知，商族是一个崇鸟民族，越族也是崇鸟民族，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越祝使用鸡卦占卜时，以氐羌人作为祭杀对象，由此可见越族是殷商时期的主体民族。

（五）殷墟卜甲上发现鸡卦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肖楠等学者在《考古》第一期发表《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一文。讲的是1980年底，考古所的两同志在安阳工作队复查1973年小屯南地陶片时，在考古队仓库发现了一包卜甲，其后进行清洗，发现甲片上有“易卦”和文字。带回北京后，经粘对复原，形成一片较完整的“易卦”卜甲。该卜甲约保留了原腹甲的四分之三。卜甲按投影测量，横宽21.6厘米、残长22.5厘米（按拓片测量，横宽23.6厘米），厚0.5~0.8厘米。甲桥保存完整，仅前后尖突部分被切锯，甲尾仅存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无存。卜甲正中间有“九”、“六”二字，这两个字上有“𠄎”的符号，和“九”、“六”并列。学术界认为，“九”、“六”就是《易经》的代表数字，因为易学又叫“九六之学”，因此，这对符号被认为是与《易经》联系最为紧密的符号，“很可能是表示‘易’之重卦的一种特殊符号”^②，它“把《周易》中最基本的数字符号和概念以及占卜方式等都体现出来了”^③。

有关学者认为殷墟上述卜甲出现的符号体现了数字易卦的“占卜方式”。关于这个“占卜方式”，《人类文明溯源》^④、《中国文明起源》^⑤、《商族源流史》^⑥等书指出：殷墟卜甲出现与易学联系紧密的占卜方式“𠄎”是鸡卦。《史记·帝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敬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

① 王平、〔德〕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③ 史善刚：《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④ 黄懿陆：《人类文明溯源》，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4页。

⑤ 黄懿陆：《中国文明起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⑥ 黄懿陆：《商族源流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



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这种“越祠鸡卜”至今仍在许多少数民族中使用和流传。但据《史记》记载，这种占卜方式的使用者和发明者均来自越人族群。

甲骨文载明越人是占卜主体，殷墟卜甲出现证明“九六之学”的《易经》的“数字符号和概念以及占卜方式”的符号其实是鸡卦的卦体。

鸡卜这种筮法始自新石器文化时期，持续了数千年乃至万年，一直没有改变。到了晚商时期还在使用。目前发现的6000多年前的数字卦中，最早见到的是在江苏省海安县青墩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骨角。骨角上刻有“数字符号，即‘463353’、‘135326’。如果我们依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将之转换成卦画，这两组数字分别是遯卦……和大壮卦……”^①。

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的研究证明，易经符号卦是在数字易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令学术界困惑不解的是，数字易卦是建立在什么具象基础之上？殷墟卜甲上出现了许多数字易卦。鸡卦本身是一种筮法，鸡卦象与数字易卦同时出现在殷墟卜甲上，表明数字易卦来自鸡卦筮法。其中，它们可以分别组合成易经中的乾坤两个经卦。关于这个卦象的分解，笔者曾写有《安阳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鸡卦符号解读——从壮族及其先民鸡卦〈易〉之起源》，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上。此外，笔者还写有《中国先越文化研究》一书，对《易经》64卦起源于鸡卦的卦象——作了研究，可证易之数卦来源于壮族先民的鸡卦。^②

九与“𠄎”组成卦象，按照《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原则，随九的卦象为天卦、阳卦、奇数卦。故直线（丨）要看成奇数一，插在表示股骨的直线上的三条斜线要看成数字三。据此，“双鸟（鸡）阴阳图”演示成为乾卦。如下图表所示：

① 杨军：《周易文化大学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② 黄懿陆：《中国先越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经卦卦象	初九	九二（插在鸡股骨上的竹签数）	九三（有窍可插竹签的鸡股骨）	乾卦的三个数字组成易卦	数字易卦转换为符号卦
 九	九	 (三)	 (一)	一 三 九	

六与“☳”组成卦象，按照《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原则，随六的卦象为地卦、阴卦、偶数卦。故直线（|）要看成偶数二，插在表示股骨的直线上的三条斜线，每一条线都要看成数字二，三条斜线即为数字六。据此，“双鸟（鸡）阴阳图”演示成为坤卦。如下图表所示：

经卦卦象	初六	六二（插在鸡股骨上的竹签数）	六三（有窍可插竹签的鸡股骨）	坤卦的三个数字组成易卦	数字易卦转换为符号卦
 六	六	 (六)	 (二)	二 六 六	

司马迁说“越祠鸡卜”，显然，商族时期的主体语言，有可能就是百越民族的语言。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越人曾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

（六）百越民族退出主体文化圈的证据

《殷墟文化研究》介绍，“江南百越民族文化分布区是印纹陶和原始瓷的发源地”，“在殷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印纹陶和原始瓷，其中印纹陶出现较早，在殷墟文化一期至四期遗存中均有发现”。但是，这种包含着鲜明的百越民族特征的“器型种类数量较少，仅有罐、豆、壶、器、盖等五六种”。^① 考古出土文物告诉我们，越文化在殷商时代虽不占主导地位，但仍然有一席之地，不过与商族使用“越祠鸡卜”巫术占卜的巨大作

^①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06～207 页。